

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三十六辑

王同春与 河套水利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^编

王同春与河套水利

内蒙古文史资料 第三十六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校办企业印刷厂印刷

内蒙古文史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印张:6.5字数:156千字

1989年12月第一版 印数1—5000

前

言

清朝末年，在河套从事水利垦殖的地商中，王同春是较为突出的一个，他以一个流浪农民，经过数十年的艰苦拼搏，兴修了大小渠道数百条，垦殖良田百万亩，建立起方圆数百里庞大的地主庄园。他在创业的过程中，既表现出新兴地商开拓进取的组织才能；同时也反映了封建地主残酷剥削的特性。因而长期以来，人们对他褒贬不一，褒之者说他开发了黄河水利，将荒芜的河套平原改变成稻粮遍地、炊烟处处的米粮仓；而贬之者则指责他施行严刑峻法，对劳动人民进行无情的迫害和掠夺。长期以来他在人民群众中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。

我们为了向有志于河套水利垦殖研究者提供一些历史资料，特选编了这期专辑《王同春与河套水利》。

收集在本书中的篇目，除了王同春事迹知情者撰写的见闻资料外，有近年来水利界的专家和史学工作者所写的考察见闻及评述文字；同时还将三十年代北京的一些著名学者、教授到河套地区实地考察所写的见闻和研究文章编入本辑。最后，我们从地方史志中摘录了记载王同春开发河套水利的有关文字，藉供参考。

本书由郝枫朱、王敬章、李西樵三同志参与搜集、整理、编辑，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张荣森同志终审。征编过程中承蒙自治区水利厅陈耳东、参事室奇天祥、原教育厅王凤鸣、社科院王龙耿诸同志以及内蒙古图书馆给予支持和协助，在此一并表示谢忱。

限于我们水平，编辑工作中存在缺点和错误一定不少，敬希读者及社会各界给予指正。

编 者

1989年10月

目 录

地商的杰出代表——王同春	陈耳东 (1)
河套水利垦殖与王同春	贾汉卿(10)
王同春事略	杜亚松(24)
河套水利事业的开拓者——王同春	李西樵(34)
王同春——河套水利开发的杰出人才	苏希贤(43)
河套引黄灌区的“开渠大王”——王同春	袁明全(92)
我所知道的王同春	韩相符(96)

王同春开发河套记	顾颉刚(111)
介绍三篇关于王同春的文字	顾颉刚(120)
一、王同春先生执记	王 诤(121)
二、附记(一)	巫宝三(127)
三、附记(二)	曲直生(128)
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	张维华(134)
河套渠道之开浚沿革	王 诤(152)

附录:

东华续录	朱寿朋 辑(186)
王同春小传	张相文(189)
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	张星烺(191)
王同春传——《绥远通志稿》	(194)
五原王绅同春行状——《临河县志》	王文昇(197)
重修河套四大股庙碑记	王建勋(199)

地商的杰出代表——王同春

陈耳东

在清末河套水利开发中，王同春作为地商的杰出代表是被社会广泛公认的。他以精通从黄河上开渠引水灌溉而著名，成为当时的“水利大家”、“工程专家”和“开渠大王”，在水利上做出许多突出贡献。

逐步走上地商的道路

王同春，字浚川，乳名进财。清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生，直隶顺德府邢台县石门村人。王幼年家贫，五岁患天花，一目失明，外号瞎进财。以后随亲属到河套谋生，习做皮毛匠。13岁后分别在磴口和临河受雇为人挖渠。18岁（同治八年）到河套东部地商张振达的万德源商号当渠工。他体强力壮，聪敏强悍，娴熟挖渠技术，两年后为短辫子壕“四大股”经理郭大义所看中，正式当了渠头。至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夏，王同春学会蒙语，租得三合庙喇嘛地一段，自行垦殖。但在浇水上和郭大义之子郭敏修发生争执，乃愤而辞去渠头职务，在老郭渠以北自行开渠，即后来历经八九年完成的义和渠。从此王同春走上地商的道路。

开渠成了“河套王”

王同春开义和渠成功，所开渠口不常淤澄，下面添加支渠，灌溉面积不断扩大，收益日增。他在住地又开设隆兴长商号，经营皮毛、粮食以及从包头一带购进的生活日用品，形成水利兴农业，农业助商业，商业支持水利。王同春以隆兴长（也成了地名）为中心，以义和渠为依靠，逐步扩展他开发水利的事业。

王同春于光绪十六年将原刚目河附近的土地和渠道收买过来，前后集资银 12.2 万两，于十八年进一步开挖丰济渠，历 8 年完成。他先于光绪十七年集资开挖沙河渠，雇用口内逃来的灾民施工，历 4 年完成，共投资工程银万余两。另外他还集资开挖了其他的较小渠道。此时他已占有整个五原一带的地方，一时名声大振，所获财富甲河套，到了光绪二十八年达到极盛时期，成为“河套王”。他的根据地隆兴长也成了全河套水利开发和经济活动的中心。清政府于第二年成立了五原厅，隆兴长又成为统治全河套的政治中心。

开渠的组织者

王同春在当时社会上所以有威望，在地商中成为杰出代表，主要在于他对水利开发的贡献和高明的治水技术。他虽然身为一地商，实际已成全河套水利开发的组织者。当时已开挖的八大干渠和一部分小干渠，或多或少都与他有关系。

(1) 自修干渠三条，即义和渠、沙河渠、丰济渠，这三条干渠完全由王同春集资主办开挖，设计和施工亦由他独自负责进行。

(2) 集资合作开挖干渠两道，即刚济渠和新皂火渠。前者，以王同春为主，集股续开，主要是选开一新口，在刚目河上游开

挖 12 公里长的输水线路，成为刚济渠。后者，是以王同春为主和地商樊三喜等集资开挖，并由王负责选定渠线和勘测设计等工作。

(3) 参与指导开挖干渠五条，其一是永济渠，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 年）收归官有后，王同春奉命参加改建整修工作。经反复勘测一个多月，选定了一条新引水渠，并创立“吸水法”，调整坡度，劈宽断面，寻找退水出路。其二是通济渠，技术上以王为主，协助郭大义开挖施工，以后又多次参与技术改建工作。其三是长济渠，在光绪年间的三次改建中，王同春均参与制定改建方案，主要是改挖新口和选定退水线路。其四是塔布渠，王同春帮助勘查，建议废弃旧天然壕，改挖成人工渠道塔布渠。最后一条是杨家河，王同春受杨氏兄弟的邀请，从口到梢反复查勘一个多月，帮助他们选定了杨家河渠线和定线工作。

上述渠道，经过历年的修挖和调整，最后成为河套灌区十大干渠的基本骨架。

高明的治水技术

王同春开渠技术一般比别的地商高明些。《临河县志》有这样一段评论：“王氏修水利有经验。每有大工，他人咋舌束手，退避不遑者，先生从容措置。高下之宜，向背之势，得失顺逆之局，均能测于机先，定于临时。一时造门请者，得其片言一语，大用之大效，小用之小效。是其果操异术哉，盖其经验有独至者然也”。这其中难免有夸大溢美之词，但王同春掌握了一套治水经验是不可否认的。说他“创此伟业，实从经验而来”是切合实际的。他的治水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：

(1) 调查了解情况，认识客观规律：王同春从小挖渠劳动，熟悉地形，勤于思索研究。他曾到宁夏灌区五次远道取经。群众

说他“识天时，谙地理”，可以预测黄河之涨落，“可以相度地势之高低。所挖渠道，无不流水畅通，所垦田土，无不收获恒丰……，察地势，辨土壤，所遇无不精思以求其理”。^①王同春本人也常与人说：“前之商人（即地商），不谙地势水性，所以（渠道）开之易，淤之亦易”。可见，认识和掌握“天时”、“地势”、“水性”和“土壤”是王同春开发水利的基本依据。

所谓“察地势”，就是调查了解地形和地面坡度等情况。王同春经过长时间的细心考察，认识到河套地势的特点是“西南高，东北低”，和过去的一般认识恰恰是个大翻个。就局部地势来说，王同春也了如指掌，认识到河套大地形是平坦的，小地形却是不平坦的，所布置渠道不求平直，该曲则曲，挖渠深度不求一律，也随地形决定其深浅，所以王同春开渠道是事半功倍，“高不病旱，卑不病涝，耕者咸获其利”。^②

所谓“识天时”、“辨土壤”，王同春的概念，基本上就是要了解水文气象和水文地质的情况。那时河套没有人搞水文，气象观测，由于工作所需，他非常注意一些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，用于指导工作。例如看见地鼠穿洞的土是湿的，他就肯定地下不深会有水。看见黄河边“其地蚁穴口有积沙”，就知道地下有明沙，不好开引水渠。当黄河水中起泡时，他就判断黄河要涨水了。

所谓“谙水性”，就是对水流运动规律的一些认识。王同春有两句格言：“水流三湾自急”和“水流百步上墙”。这和孟子所说：“今夫水，博而跃之，可使过颡，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”，是一样的意思。王同春所说“水流三湾自急”中的“湾”字，大概是一指渠道在平面上的转弯处不平顺，或弯曲过多，会被水流冲毁渠背，发生决口等情况；二是渠道纵剖面上的局部突然升降，水流也会

①张维华：《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》，《禹贡》第六卷第五期。

②见四大股庙碑文。

起破坏性作用，不利于渠道和建筑物的稳定；三指在一定的情况下，也可利用弯道处的壅高水位，便于引水浇地；四指利用弯道损失水头，也可调整渠道坡度。

(2) 朦胧的治水方略思想：王同春面对地商从黄河开口引水的渠道日渐增多，引水浇地互相影响，致使下游的渠道往往引不进水来的情况，认识到上下游必须统筹规划。他生前勾画的《复兴后套计划渠图》（见第6页图1），曾设想把河套的各大干渠从西到东挖两道大连环渠，以便调节上下游渠道的水量余缺。这也可认为是日后开挖总干渠的思想萌芽。王同春还主张将乌加河黄河故道疏通，再由王六子壕挖通退水，“使尾间纵横贯注”，以期一劳永逸。

(3) 善于选择引水渠口：在黄河上如何选择引水口，不使淤澄，也是王同春比其他人高明之处。从实践中，他认识到“渠口的水力往往与很远的上游有关系。要尽量利用水力冲刷，减少渠口淤积”。每当他选择渠口，常是反复勘查多次才能定下来。定的位置多在黄河凹岸靠下面的地方，或是在套河上引倒漾水（见第7页图一2），这样所进泥沙就会少些。王同春给所开渠道定的“吸水法”，除了选择适当的引水渠口外，在下面还要寻找退水出路。一般是退到沙海子或乌加河和乌梁素海，形成“上引下拉”的水力冲刷系统，能够保持“流水畅旺”。而别的地商开渠由于不懂“吸水法”的奥妙，往往是“屡开屡废，工巨利微，几成荒土”。①

①见四大股庙碑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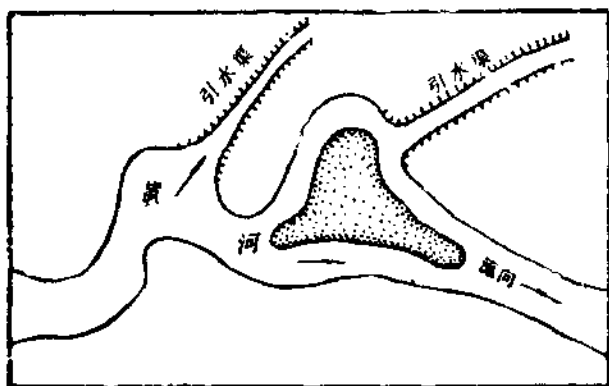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4-2 选择引水渠口示意图

(4) 有一套测量地形的土技术方法：王同春在工作中逐渐形成一套测量地形的技术方法。例如下雨天，他冒雨往外跑，以观察地面径流的流转方向，作为测量地形的标志。在勘定的渠线上，黑夜中，他叫人点上三盏灯，放在地面的一条直线上，然后他趴在地上，一段一段地观测地形高低，并打桩标记，以决定渠道开挖的深浅。王同春还会心算渠道的断面和土方，以及渠道的纵坡等，大体上均能做到八九不离十。《河套调查报告书》的作者冯际隆在实地调查和同王同春详细交谈后，说他“阅历甚富，其于渠道工程计划虽不谙习现代测量技术，而卧地以窥，即能查知地面之高下”。民国8年（1919年），王同春勘测设计了老郭渠的全盘整修工程计划，并亲自监工施工。后经冯际隆用现代科学测量方法验证，测量渠口一段的坡度为 $1/3500$ ，很合乎要求。王同春还计算新整修后的渠道一昼夜能行水120里，渠中流量可日灌田4000亩，冯际隆深惊其精细。义和渠是王同春一手开挖的渠道，冯氏为之进行了全线纵断面测量，在51000米的渠线中，渠口一段坡度为 $1/7400$ ，中间一段为 $1/9200$ ，最后一段为 $1/11000$ 。限于地形条件，这样调整坡度是切合实际的。

和蒙古族人民团结治水

王同春身处蒙古地区，和蒙古族人民搞好关系，团结治水，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他首先学会说蒙语，无论和蒙旗王公上层或一般牧民群众都可直接交谈，处理问题。其次，他对待蒙古族人“示之以诚”，一向讲信用，按契约交地租，对他们的困难，常给以资助，取得了广泛的信任。他善与蒙古族人交涉，“所交涉的事无不成者”^①。甚至蒙族之间的纠纷，只要他参与调停就能解决。例如开挖沙河渠就是这样。事前因达拉特旗上层之间发生内争，王同春亲为调解，费时月余，耗银 2000 两，始告平息。达拉特旗因感念他的帮助，遂将隆兴长以西的土地租与耕种^②，王因而开挖沙河渠。又如始谷办垦，分裂杭锦旗上层和一般蒙民的关系，蒙民声称要杀死梅楞棍布，然后再向垦务局理论，也赖王同春从中调解，得以平息^③。王同春的渠地被官收之后，达拉特旗和西公旗都主动租地给他，以解决其困难。清政府要逮捕他，他跑到杭锦旗王爷处躲避，受到保护，能在游牧之地牢牢站稳了脚跟。当然，在个别情况之下，因清政府的反动政策和王同春个人的局限性，与个别蒙族上层的关系也曾短暂地出现过一些摩擦，不过总的来说是蒙汉人民和睦相处，团结治水，共同开发了河套。

最终结局

在光绪二十九年，王同春和其他地商的命运一样，渠地全被始谷强迫“报效”交官。他的水利事业开始走下坡路，本人最后也完全成了封建大地主。民国期间，统治者也曾叫他帮办水利，但

^①见四大股庙碑文。

其作用已大为逊色。民国 14 年春，冯玉祥任命他为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总参议，协助石友三督办河套水利。当年 6 月，因从事水利野外勘察染疾，病故于五原，终年 74 岁。

王同春作为清末地商的一位杰出代表，对开发河套水利的贡献是很大的。通过他的治水活动，奠定了近代河套水利开发的基础，成为地方上一位重要的治水人物。出现这么一个治水人物不是偶然的，劳动群众进行大规模水利开发和生产实践活动是王同春成功的基础。但历史局限性，限制了他个人治水事业的更高发展。

(原载陈耳东著《河套灌区水利简史》)

河套水利垦殖与王同春

贾 汉 卿

前 言

河套农垦水利的开发，据史书记载，远在几千年前，已在我们的辛勤劳动下，获得不少成绩。迨及清末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有直隶顺德府（今邢台县）王同春，来河套数十年，以毕生精力从事农垦水利，成为当时田连阡陌，库藏万金，渠道纵横的大地商和水利家。有关他的事迹，流传甚广，或见诸史籍，或立碑树传，多有记载。如清光绪二十八年（公元1902年）五原县四大股庙，就曾竖有一座“重修诸神庙并开渠筑堤碑”。其碑文由商隐、王建勋（雷峰）撰书，其中有如下记载：

“是地距河咫尺，开渠灌亩，咸仰黄河之水，数十年来，商人不啻千百，屡开屡淤，工巨利微，几成荒土。光绪初年，有直隶顺德王公讳杰者，偕其子王同春字浚川，来游是地，见大河萦绕于前，福山鍾灵于后，草木蔚然，地皆膏腴，寥寥水田，渐成陆地，喟然叹曰：前之商人，不谙地势水性，所以开之易，淤之亦易。彼时地皆有主，无听其言者，山西交城商人张公振达，独具双眸，邀请同春公至公中，酌量重新开渠之事，公即应允，度其高下，即为兴工，不数日，工人鳞集，遵夏禹王导河之法，效神李冰开渠之规，渠口宽狭合度，深浅得宜，高不病旱，卑不病涝，耕者数百户，咸获其利。二年来，不知歉岁，家给人足，老

安少怀，虽藉二仪之造化，实资一人之经济。”

最后一段，尚有以下称赞：“物阜民安，尧天舜日，其河套乎。”

民国14年，王同春病逝后，他的家属曾在五原建立“王同春祠堂”，并龛奉一尊“绥远河渠总河神王同春之神位”。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，还要在王同春祠堂前，献戏3至5天，承受香火。民国24年（公元1935年），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写了一篇《王同春开发河套记》刊载于同年2月16日出版的《禹贡》（半月刊）第二卷十二期上。他对王同春开发河套的事迹，也做了一些功过评说，“一个不识字的人，能够赤手空拳创出这番大事业来，那不够我们的纪念？再说倘使官民能合作，他的成绩又将怎样？所以张相文沉痛地说，王同春是不幸而生于中国。”

对王同春开发河套事迹的记载除《临河县志》附有一篇简短行状外，《绥远通志稿》也有一些片断的记录，其他则多散见于书报杂志，因无完整的文献可稽，只得东鳞西爪广为探访收集。仅就现有资料，将河套的自然环境与农垦水利开发沿革，以及王同春的家业史略，逐节写出，难免贫乏、残缺之虞，望知情者予以充实指正。

河套的自然环境

号称“塞外江南”与“天府之国”的河套，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盟的东部。它的自然环境，是乌拉山及色尔腾山以西，喀拉那伦山以东，狼山山脉以南至黄河新道之间的一片冲积地带。西起东经107度至109度，南起北纬40度半，北至41度半。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。

色尔腾山、狼山山脉以北便是有名的蒙古高原；喀拉那伦山以西，属于阿拉善旗沙漠的领域；黄河新道以南是鄂尔多斯高

此。以上各区都是内流地带，惟过乌拉山以东至默特干原，是与河套东西遥对的冲积沃野，黄河源流出于4,000公尺以上的山岳地带，雨量比较充沛，而且常年积雪，也供给充分的雪水。所以黄河自甘肃境，北出贺兰山与鄂尔多斯间的峡谷以后，还能有充分力量以穿过雨水较少的半沙漠地域，更因为地势关系造成了河套的冲积平原，以使数千里沙漠之中，有此沃野。

河套的农垦水利开发沿革

河套水草丰盛，地势平坦，其在古代，原未入中国版图。三代时期，无确切考证。秦始皇统一了中原以后，曾以武力占有河套。据《史记匈奴传》说：“秦灭六国，而始皇帝命蒙恬将10万之众北击胡，收河南地，因河为塞，筑44县，城临河，徙谪戍以充之。……又渡河据阴山北假中。”

又据《史记·始皇本纪》说：“三十六年迁河北，榆中3万家。”又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注引应劭的话说：“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，得其河南阴山之北千里地，甚好。于是为筑城郭，徙民居之，名曰新秦。四方杂错，奢俭不同，今俗名新富贵为新秦，由是名也。”

这些迁入河套的移民，都是内地的劳动人民，掌握一定的农业技术。他们迁入套以后，利用大片土地和水利从事垦殖，一方面赡养自身，一方面供给戍卒。这也是当时嬴秦移民实边的措施。可见河套的开发，实开始于秦始皇。

自秦始皇末期到汉武帝中间相隔七八十年，在这一时期，开发河套的事业完全中断。汉武帝即位后，他为了筑城置卫，竭力促使移民。

据《汉书·武帝纪》说：“元朔二年，遣将军卫青、李广，出塞中，至高阙，遂西至符离。……收复河南地，置朔方、五原

郡。”

《史记·匈奴传》也说：“于是略取河南地，筑朔方，复缮故秦时蒙恬取为塞，因河而为固。”

《汉书·武帝纪》又说：“元朔二年夏，募民徙朔方 10 万口。”

而《汉书·武帝纪》又载：“元狩四年冬，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、北地、西河、上郡、会稽，凡七十二万五千口。”

这 72.5 万口，除一部分移入陇西，会稽两郡外，大部分都移入河套。这些移民入套以后，都从事农垦生产。

又据《汉书·食货志》说：“元朔六年上郡、朔方、古河、河西，开官田斥塞卒 60 万人戍田之。”“武帝时期，朔方亦穿溉渠，作者各数万人，历二三期而未就，费亦各以钜数十万。”

《史记·匈奴传》也说：“是后匈奴远遁，漠南无王廷，汗流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，往往开渠，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。”

汉武帝既然不募平民，发遣戍到河套从事农垦，开渠用费达钜数十万，田官塞卒达 60 万人，可以想见当时的河套，一定是田畴遍野，城连邑接了，所以说河套的开发，在西汉初期，曾盛极一时。但在元帝而后，河套的开发，以环境突变，无形中止。

又据《汉书·王莽传》说：“始建国三年，遣尚书大夫赵并使劳北边，还言五原、北假膏壤殖谷，并时常置田官，乃以并为田禾将军，发戍卒屯田北假，以助军粮。”

但王莽称帝不久，就逢内乱，故屯田成绩不大，嗣后经过三国两晋，河套沦为战场，农垦水利，受到很大影响。

元魏灭夏，开发河套又加紧进行。据《魏书·太祖纪》：“登国九年，帝北巡，使东平公文仪，屯田于河北五原至于固阳塞外。”

《魏书·食货志》也说：“使东平公文仪，垦辟河北，自五原至于固阳塞外为屯田。”

又据《山西通志》说：“固阳在五原郡东，今包头市一带地。